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与发展中 国家间 FDI 竞争^{*} ——基于寡占竞争模型的理论分析

林龙辉¹, 向洪金², 冯宗宪¹

(1.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2.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9)

摘要:文章建立了一个两国竞争模型,重点分析了进口关税与出口补贴等战略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吸引 FDI 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两国都采取出口补贴的外资激励政策时,工资水平和进口关税对发展中国家间 FDI 竞争并没有直接影响;(2)对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来说,当两国的关税水平都较高时,出口补贴政策增加流向本国的 FDI,而当两国关税水平大幅下降后,出口补贴政策反而不利于本国 FDI 竞争。文章的结论对当前我国战略引资和出口退税等政策的调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FDI 竞争; 战略贸易政策; 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0)05-0054-11

一、引言

鉴于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吸引 FDI,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超过160个国家制定了外资激励(Investment Incentives)政策,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本国资本的匮乏,需要依靠外国直接投资来解决就业、增加收入并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间的 FDI 竞争非常激烈。

税收优惠一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最常用和最主要的 FDI 激励政策,但税收优惠政策会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一些不利影响:首先它减少了东道国的税收收入;其次,由于税收政策的差异,往往使本国企业处于不公平的

收稿日期:2010-01-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173012)

作者简介:林龙辉(1971—),男,福建厦门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向洪金(1976—),男,湖南怀化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冯宗宪(1954—),男,浙江宁波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竞争环境,不利于本国企业的发展;第三,各国政府为了吸引更多 FDI,竞相提高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程度,结果导致 FDI 的恶性竞争。因此近年来,不少国家决策者开始调整 FDI 激励策略,从单纯的税收优惠转向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整体投资环境等多种竞争手段相结合。

研究进出口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FDI 竞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往往采取“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的战略引资政策,即利用出口补贴(退税)等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在本国生产后出口世界市场;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基础产业的发展,往往又采取“进口替代”的产业保护政策,对进口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这将大大增加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因此进出口贸易政策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会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 FDI 竞争的重要手段。然而已有研究 FDI 竞争的文献大多都是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影响发达国家之间的 FDI 竞争,对于进出口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 FDI 竞争的问题较少涉及。

本文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战略引资的现实背景,建立一个一般均衡的两国竞争模型,首先分析最优出口补贴水平的确定,即探讨出口补贴政策的内生化问题;然后重点研究在不同的情况下,出口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FDI 竞争;最后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对当前我国战略引资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进行简要的评述,并给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

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FDI 也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热点问题而受到广泛关注。一般来说,研究 FDI 的文献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是研究 FDI 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即 FDI 的经济效应;^①二是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即决定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进行投资的“初始决策”(initial decision);三是探讨不同国家之间为吸引 FDI 而展开的竞争以及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locational decision)问题。由于相关文献十分丰富,本文仅对研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以及国家间 FDI 竞争方面的文献作简要概述。

研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文献中以实证居多。Head, Ries 和 Swenson(1995)、Hines(1996)以及 Devereax 和 Griffith(1998)等文献利用不同的计量模型研究了流向发达国家的 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东道国税收政策、产业集群效应等因素对 FDI“区位选择”具有较大影响。少数文献则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例如 Lucas(1993)、Wei(2000)、Azemar 和 Delios(2007)对发展中国家各种因素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市场规模、税收政策等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

资水平、劳动生产效率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等因素也会对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法,例如 Mintz 和 Tsiopoulos (1992)通过对一些转型国家有关数据的分析后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利用博弈理论研究了国家间为吸引 FDI 而展开的竞争行为。Black 和 Hoyt(1989)是最早研究国家或地区间为吸引 FDI 而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竞争(tax competition)的文献之一,该文构建了一个共同代理人模型(common agent model),即参与 FDI 竞争的两个国家或地区为委托人,计划对外投资的跨国公司作为二者共同的代理人,两国在基础设施、工资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但是在该文的分析中,作者假设外国投资是不可分的,即投资或者全部投向 A 国,或者全部投向 B 国。Haparanta(1996)在 Black 和 Hoyt 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当跨国公司的投资为可分时(即跨国公司可以决定在两个竞争国之间分配多大比例的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在竞争国之间进行投资分配。研究发现,通过税收调节,即使工资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有可能获得部分外国投资。Haufler 和 Wooton(1999)则建立了一个局部均衡的两国竞争模型来分析税收政策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大小对市场导向的 FDI 竞争的影响,主要结论是,本国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在市场导向型 FDI 竞争中将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且当市场规模足够大时,该东道国甚至可以对外资企业征收一定的税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献研究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是资源导向型或市场导向型的,东道国也主要是发达国家,而研究战略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之间出口导向型 FDI 竞争的文献比较鲜见。起源于 Bander 和 Spence(1985)等文献的战略贸易理论认为,在边际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为了使本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垄断市场获得竞争优势,政府往往会采取出口补贴等干预主义贸易政策。Janeba(1998)对战略贸易理论进行拓展,分析了东道国出口补贴政策对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不过 Harris 和 Schmit(2001)的文章才是第一篇重点研究战略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之间 FDI 竞争的文献。通过构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作者分析了进出口贸易政策对两个规模不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 FDI 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两国关税水平都较低时,出口补贴政策使工资水平低的国家得到的 FDI 增加;反之,两国关税水平都较高时,出口补贴反而会使工资水平低的国家得到的 FDI 减少。但是 Harris 和 Schmit 假设两个东道国的规模较小,FDI 会对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分析的切入点是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差异。本文的不同在于强调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在 FDI 竞争中的作用,分析的切入点是两

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 FDI 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的侧重点在于 FDI 对我国 GDP、进出口等经济总量以及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即主要研究 FDI 对我国的经济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而研究 FDI 国际竞争的文献不多。例如江小涓(1999)等对 FDI 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史小龙(2004)等则实证分析了 FDI 与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关系;赖明勇(2005)等探讨了 FDI 的技术外溢效应,但就贸易政策如何影响我国 FDI 竞争还没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两国 FDI 竞争模型

(一)基本模型

我们从 Harris 和 Schmit 的模型出发,但为使其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该模型做了改进:第一,Harris 和 Schmit 假设两个东道国都是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工资水平由流入该国的 FDI 规模决定。考虑到大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供应充裕,FDI 在短期内对工资水平并没有实质影响,因此本文假设工资水平由政府的工资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外生决定,而且劳动供给具有完全弹性。^②第二,Harris 和 Schmit 假设竞争的两国对跨国公司生产所用的中间投入品进行补贴,但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由于担心遭受反补贴制裁,往往利用出口退税等政策间接对出口品进行补贴。第三,Harris 和 Schmit 强调工资差异在 FDI 竞争中的作用,但部分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水平差异在以出口导向的跨国公司投资决策中并不一定起决定作用,东道国劳动生产率以及整体投资环境也是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本模型突出全要素生产率对 FDI 竞争的影响。

假设存在两个劳动力供应充足的发展中国家($i=1,2$)为吸引更多 FDI 展开竞争,这里令 1 代表本国,2 代表外国;并且每个国家都只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由本国企业垄断专门生产中间投入品的部门,这个部门存在进口竞争(import-competing),即跨国公司既可以使用东道国生产的中间投入品,也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中间投入品;另一个是由跨国公司(MNE)垄断的出口部门。如果两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的进口竞争产业而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对进口的每单位中间投入品征收关税 t_i ,则跨国公司所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价格为:

$$p_i = p^* + t_i \quad (1)$$

其中 p^* 表示中间投入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1)式同时也是本国进口竞争部门的产品价格。

假设跨国公司(MNE)计划在两国进行投资,总的投资额 $\bar{x} = x_1 + x_2$ (x_1 、

x_2 分别表示分配给两个国家的投资额),且跨国公司在两东道国生产每单位产品需要一单位的劳动和 b_i 单位的中间投入品(b_i 由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并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国家 b_i 较小,由于 FDI 的技术外溢, b_i 可能会随着东道国外资数量的变化而变化,但因为本文重点是分析贸易政策对 FDI 竞争的影响,因此我们简单假设 b_i 为固定常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假设两个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分别为 w_i ,由两国的工资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而且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同时两个东道国为了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都采取出口补贴政策,且对每单位出口产品的补贴为 s_i 。根据以上假设,跨国公司在两东道国生产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

$$c_i = w_i + p_i b_i - s_i = w_i + (p^* + t_i) b_i - s_i \quad (2)$$

除了生产成本,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政治环境等也会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因此跨国公司的总成本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TC = \frac{k_1}{2} x_1^2 + c_1 x_1 + \frac{k_2}{2} x_2^2 + c_2 x_2 \quad (3)$$

其中, k_1 和 k_2 分别表示跨国公司在本国和外国每单位投资的经营管理成本,由两国投资环境的优劣决定,且 $k_i > 0$; c_1 和 c_2 分别表示跨国公司在本国和外国生产单位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由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跨国公司分配给本国和外国的最优投资额分别为:

$$\begin{aligned} \hat{x}_1 &= \frac{1}{k} [k_2 \bar{x} + (c_2 - c_1)] \\ \hat{x}_2 &= \frac{1}{k} [k_1 \bar{x} + (c_1 - c_2)] \end{aligned} \quad (4)$$

其中, $k = k_1 + k_2$ 。(4)式表明跨国公司分配给两国的投资是经营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线性函数,并且与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生产成本呈负相关关系,与跨国公司在竞争对手国的生产成本呈正相关关系。

考虑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劳动收入,解决本国的就业难题,往往采取出口导向的战略引资政策,因此我们假设跨国公司在两东道国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到第三方市场,两东道国出口部门的出口数量等于分配给两国的投资额 x_i ,因此两个东道国政府的目标函数如下:

$$W_i(x_i, s_i, w_i, t_i) = (w_i x_i + t_i b_i - s_i) x_i \quad (5)$$

以上为本文模型的基本框架,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分析出口补贴、进口关税、投资环境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 FDI 竞争的影响。

(二)最优投资分配

上述模型实质上是一个两阶段博弈。在第一阶段,为了吸引 FDI 展开竞争的两个国家政府首先制定诸如出口补贴、进口关税以及最低工资水平等影响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经济政策;在第二阶段中,跨国公司根据两国相关政策

决定投资分配额。我们可以通过逆向归纳法求出该博弈过程的子博弈纳什均衡解，从而得出两国政府的最优外资激励政策和跨国公司的最优投资分配。

首先把(4)式表示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分配用两国的工资水平、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等变量表示如下：

$$\begin{aligned}\hat{x}_1 &= \frac{1}{k} [k_2 \bar{x} + (w_1 - w_2) + p^* (b_2 - b_1) + b_1 (s_1 - t_1) - b_2 (s_2 - t_2)] \\ \hat{x}_2 &= \frac{1}{k} [k_1 \bar{x} + (w_1 - w_2) + p^* (b_1 - b_2) + b_2 (s_2 - t_2) - b_1 (s_1 - t_1)]\end{aligned}\quad (6)$$

(6)式比(4)式更加清楚地表明两国的工资水平、出口补贴、进口关税是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分配。

由于进口关税、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变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出口补贴政策成为两国主要的竞争手段。因此我们假设进口关税等变量保持不变，用逆向求解法，把(6)式分别代入两国的目标函数，根据两国的反应函数求得两国的最优出口补贴：

$$\begin{aligned}\hat{s}_1 &= w_1 + t_1 b_1 + \frac{1}{3} p^* (b_1 - b_2) - \frac{1}{3} \bar{x} (2k_2 + k_1) \\ \hat{s}_2 &= w_2 + t_2 b_2 + \frac{1}{3} p^* (b_2 - b_1) - \frac{1}{3} \bar{x} (2k_1 + k_2)\end{aligned}\quad (7)$$

显然，东道国最优的出口补贴水平由两国的工资水平、进口关税水平、劳动生产效率以及两国投资环境等因素决定。再把两国最优补贴(7)式代入到跨国公司的目标函数，可以求出跨国公司投资分配的均衡解：

$$\begin{aligned}\hat{x}_1 &= \frac{1}{3k} [\bar{x} (k_1 + 2k_2) + 2p^* (b_2 - b_1)] \\ \hat{x}_2 &= \frac{1}{3k} [\bar{x} (k_2 + 2k_1) + 2p^* (b_1 - b_2)]\end{aligned}\quad (8)$$

在总投资不变的前提下，(8)式即为保证跨国公司成本最小化的投资分配。该式表明跨国公司的最优投资分配由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工资水平和进口关税水平对跨国公司的最优投资行为并没有直接影响，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 1：当两国都对出口导向型 FDI 采取出口补贴的激励政策时，跨国公司最优的投资分配只与两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环境有关，而与两国的工资水平和贸易保护水平没有直接关系。

这是因为在 FDI 竞争中，理性的政府会根据两国工资和关税差异来调整自己的出口补贴水平，即出口补贴政策会削弱工资水平和进口关税水平差异在 FDI 竞争中的作用。例如工资或关税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在 FDI 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往往会趋向采取较高的出口补贴水平。

四、出口补贴政策对 FDI 竞争的影响

上述模型表明,东道国最优的出口补贴政策受竞争双方的进口关税、工资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的影响。在该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在不同情况下出口补贴政策是如何影响 FDI 竞争的。

(一) 自由贸易政策

为了分析贸易政策对投资的影响,我们假设两国的投资环境相同,即 $k_1 = k_2$,而且起初两国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即 $s_1 = s_2 = 0, t_1 = t_2 = 0$,则跨国公司的投资分配函数(6)式可以简化为:

$$\hat{x}_1 = \frac{\bar{x}}{2} + \frac{1}{k} [p^* \Delta b + (w_2 - w_1)] \quad (9)$$

其中, $\Delta b = b_2 - b_1$, Δb 反映了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情况,不妨假设 $b_2 > b_1$,即 $\Delta b > 0$,表示本国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对手国(注意这里的 b_1 不是直接表示对应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是与该国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由于假设工资水平由两国工资政策外生给定,(9)式表示在两国都不采取出口补贴的激励政策时,两国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和分配给本国的投资的关系,显然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吸引的投资也越多,二者关系如图 1 中 NAP 线所示。

当两国都采取出口补贴的激励政策时,由(8)式可得出,跨国公司对本国的最优投资为:

$$\hat{x}_1 = \bar{x} + \frac{2}{3k} p^* \Delta b \quad (10)$$

该式表明,当两国的整体投资环境相同,且两国都对 FDI 采取出口补贴的激励政策时,跨国公司的最优投资主要由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并且 Δb 和 $\hat{x}_1$ 间的关系如图 1 中的 AP 线所示。

根据相关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提升东道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FDI 的技术外溢效应更大,因此当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时, Δb 和 $\hat{x}_1$ 间呈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当本国得到的投资越多,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使本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而使 b_1 减小,而对手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因此 Δb 和 $\hat{x}_1$ 间的直接关系可以由图 1 中的 TFP 线来表示(当然 TFP 线也可以是负的斜率,表示外国投资对本国的生产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这对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实质影响)。

图 1 可以说明出口补贴政策影响 FDI 竞争的情况。根据上面的解释, NAP 线表示两国都没有采取出口补贴激励政策时的情况,而 AP 线表示两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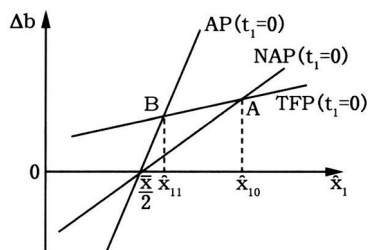


图 1 进口关税水平较低时出口补贴对流向本国 FDI 的影响

都采取出口补贴政策时的情况, AP 线的斜率大于 NAP 线, 即出口补贴政策部分削弱了生产效率在 FDI 竞争中的作用。从图 1 可以看到, 最初两国都不对 FDI 采取激励政策时, 均衡点为 A 点, 跨国公司分配给本国的均衡投资额为 $\hat{x}_{10}$; 而当两国都采取出口补贴的激励政策时, 均衡点从 A 点移动到 B 点, 此时本国得到的均衡投资额为 $\hat{x}_{11}$, 显然出口补贴政策使本国得到的 FDI 会减少, 而竞争对手国得到的 FDI 会增加, 从而我们得到了本文第二个重要结论。

结论 2: 当两国对进口部门的贸易保护程度都较低时, 出口补贴的 FDI 激励政策反而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得到的 FDI 减少, 而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得到的 FDI 增加。

结论 2 可以部分地解释, 为什么以前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往往同时采取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政策, 但随着本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深入, 则开始调整或取消对外资的税收和出口补贴等优惠政策, 而现在像印度、越南等开放较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近年来则不断提升对外资的优惠力度。

(二) 贸易保护政策

事实上,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基础产业的发展, 对进口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 以保护本国的薄弱行业, 即所谓的“进口替代”政策, 同时为了增加就业, 采取出口导向的战略引资政策。^③ 那么, 当两国贸易保护程度较高时, 出口补贴政策又将如何影响 FDI 竞争呢?

假设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对手国, 即 $t_1 > t_2 \geq 0$ 。同样先分析两国都不采取出口补贴政策时的情况。本国关税的相对升高使跨国公司在本国单位生产成本相对增加, 因此在相同的生产效率差异时, 跨国公司分配给本国的投资必然减少, 在图中表现为 NAP 线位置左移; 当两国都采取出口补贴政策时, 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对手国, 为避免本国在 FDI 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本国将提高出口补贴水平, 而对手国则降低其出口补贴水平, 从而导致 AP 线右移。

如图 2 所示, 图中虚线表示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时的情况, 当本国的关税水平较高时, 原来的 NAP 和 AP 线都会发生移动, 并且移动到相应实线表示的位置。为简单起见, 我们假设 TFP 线位置不变。

图 2 可以用来说明当本国贸易保护程度较竞争国高时, 出口补贴政策影响两国 FDI 数量的情况。图 2 中各直线表示的含义与图 1 相同, 只是由于本国较高的关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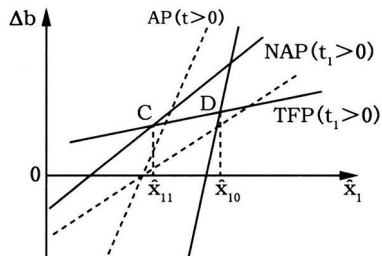


图 2 进口关税水平较高时出口补贴对流向本国 FDI 的影响

水平使各曲线位置发生了移动。当本国采用出口补贴政策时,均衡点从 C 移到 D,本国得到的均衡投资额由 $\hat{x}_{10}$ 增加到 $\hat{x}_{11}$,即出口补贴政策使跨国公司分配给本国的 FDI 增加;而当本国贸易保护程度低于对手国时,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可以得到本文第三个结论。

结论 3:当本国全要素生产率和贸易保护程度都高于竞争国时,采取出口补贴政策可以使流向本国的 FDI 增加;相反,当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而贸易保护程度较低时,出口补贴的外资激励政策会使流向本国的 FDI 减少。

五、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本文基于发展中国家战略引资的现实背景,构建了一个 FDI 竞争模型,重点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出口补贴政策对出口导向的 FDI 竞争影响。研究发现,当两国都采取出口补贴的 FDI 激励政策时,跨国公司最优的投资分配只与两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整体投资环境有关,而与两国的工资水平和贸易保护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出口补贴政策并不总是有利于本国的 FDI 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来说,当两国贸易保护程度都较低时,采取出口补贴的激励政策反而会使本国得到的 FDI 减少。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对我国战略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从 2003 年开始,我国成为世界上吸收 FDI 最多的国家,税收减免政策一直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但根据 2007 年 3 月颁布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从 2008 年 1 月开始,我国将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税收政策,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将成为历史。由于出口导向的 FDI 占我国外商投资的很大比例,在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取消后,我国应该充分发挥进出口贸易政策在我国战略引资中的重要作用。

2.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我国的进口关税水平普遍较高;同时为了鼓励出口,利用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产品进行补贴。根据本文的结论 3,当竞争国家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整体关税水平较高时,出口补贴政策有利于本国出口导向的 FDI 增加。因此在我国以及周边国家关税水平都较高的经济环境里,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能够增加我国在国际 FDI 竞争中的优势。

3. 我国在 2006 年 9 月和 2007 年 7 月两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下调了大部分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补贴会不会导致我国出口导向的 FDI 减少? 本文的结论 2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竞争国家的贸易保护程度都比较低时,增加出口补贴反而会使本国的 FDI 减少;反之,降低出口补贴会使本国在 FDI 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近年来,在 WTO 自由贸易谈判框架下,世界整体关税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我国在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 组织后,进口

关税水平整体上也大幅下降。因此,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关税水平大幅下降后,适当地降低出口补贴反而有利于我国出口导向的 FDI 竞争。

4.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我国是否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争论不休。反对者的主要根据是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会增加外资企业的劳动成本,从而减少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本文的结论 1 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定启示,根据结论 1,工资水平差异对劳动力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的 FDI 竞争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劳动生产效率才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因此从长期来说,我国不应把低工资水平作为 FDI 竞争的主要手段,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提升我国在国际 FDI 竞争中的优势的根本所在。

* 此文也受到西安交通大学“985 工程”二期项目(项目编号:07200701)资助。

注释:

- ①根据有关文献,FDI 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1)弥补本国资本的不足;(2)增加本国的就业;(3)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4)增加财政收入。
- ②杨泽文、杨全发(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FDI 至少在短期内并没有对我国整体工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而且 FDI 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
- ③进口替代政策指利用关税等保护措施来促进国内产品的生产从而替代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并以此来发展本国工业的战略。进口替代战略曾为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作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江小涓. 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 管理世界 1999,(2):7—15.
- [2]史小龙,张峰.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4,(4):42—47.
- [3]赖明勇,包群,彭水军,等.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J]. 经济研究,2005,(8):95—105.
- [4]杨泽文,杨全发. FDI 对中国实际工资的影响[J]. 世界经济,2004,(12):41—48.
- [5]Head K, Ries J, Swenson D.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38: 223—247.
- [6]Hines J R. Altered states: Tax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meric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 1076—1094.
- [7]Devereux M, Griffith R. Taxes and the location of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 multinational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68: 335—367.
- [8]Lucas R. On the determinant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J]. World Development. 1993. 21 (3): 391—406.
- [9]Wei S J. Natural openness and good government[R]. 2000, Working Paper No. 2411, The World Bank.
- [10]Céline Azéma, Andrew Delios. Tax competition and FDI: The special cas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8, (1): 85—108.
- [11]Minlz Jack M, Tsiopoulos, Thomas. Corporate income tax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

- vest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R]. Foreign Investment Advisory Service Occasional Paper, 1992, No4, World Bank.
- [12] Black D, W. Hoy L. Bidding for fir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1249—1256.
- [13] Haaparanta P.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3 (1): 141—153.
- [14] Haufler A, I Wooton. Country size and tax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9, 71: 121—139.
- [15] Brander J A, Spencer B J.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 18: 83—100.
- [16] Eckhard Janeba. Tax competition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4: 135—153.
- [17] Richard G Harris, Nicolas Schmitt. Strategic export policy wi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port substitu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 64: 293—312.

Export-oriented Trade Policy and FDI Competi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LIN Long-hui¹, XIANG Hong-jin², FENG Zong-xian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a competition model with two countri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such as import tariffs and export subsidies on the attraction for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wage level and import tariff have no direct effects on FDI competition if both developing countries take export subsidies policies; secondly, as to countries with high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port subsidi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FDI under high tariff level, but if both countries' tariff levels come down by a big margin, export subsidies are not beneficial to domestic FDI competition. The conclus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olicy adjustment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and export tax rebate.

Key words: developing country; FDI competitio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 周一叶)